

编者的话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位伟人，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就是淮安人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的日子。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0年了。为缅怀他的伟大功绩，表达家乡人的深切怀念，淮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委通过周恩来纪念馆管理局周恩来研究专家张秋兵同志，搜集到一些周恩来亲属、下属以及曾为周恩来服务过的宾馆服务员等所撰写的“三亲”史料，合辑为本期《文史活页》。希望文稿中那些真挚温暖的文字，能让广大读者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全党楷模”周恩来的伟大人格与崇高风范，更加自觉地以周恩来为榜样，砥砺前行，接续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目
录

香港赴展见闻	
——蒋经国先生曾称赞伯父周恩来	
.....	周秉德 / 1
伯父支持我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	周秉宜 / 7
要做一个最普通的人	
——怀念敬爱的恩来伯伯与颖超伯母	
.....	周尔均 / 13
怀念我们的七叔.....	周华绂 / 22
老红军杨志宏眼中的周恩来	
.....	杨志宏 口述 曹春荣 整理 / 24
难忘的一次握手.....	周研森 / 31
伟大的声音.....	李连庆 / 33
见微而知著	
——周总理是铭刻我心中的丰碑	
.....	侯云珍 / 43

编
委
会

主 任	毕丰书 徐效文
委 员	马继峰 胡鸿章 周忠跃 刘志平
主 编	马继峰
副 主 编	胡鸿章
执行主编	刘志平
责任编辑	朱慕雯
编 辑	朱维明 陈 瑾

香港赴展见闻

——蒋经国先生曾称赞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

(一)

2007年2月26日，我应邀出席了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为中华之崛起——周恩来生平事迹展》开幕式，所见所闻使我印象深刻，很受感动。

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崇敬与热爱，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9周年，并使香港的青年学生能够系统地了解周恩来总理的伟大人格，铭记他为祖国的繁荣、民族的兴旺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更好地学习他的崇高精神，香港满威利基金会及何东舜铭国际文化基金主席何东舜铭先生、副主席陈复生女士积极与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联系，经过近一年周到细致的筹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及大公报社等六个机构共

同举办了这一展览。

满威利基金会将拙作《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在香港印制出版繁体字版，也在展览开幕仪式前召开了出版新闻发布会。

出席展览会开幕式的主礼嘉宾规格很高：除主办方领导人员外，还有



周秉德与伯伯周恩来(摄于1951年)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中联办副主任郑坤生，96岁高龄、德高望重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老先生，何东国际关系问题学会主席何东等。此外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群及第二编研部主任廖心文女士，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伯父生前秘书纪东，卫士高振普等。

展览现场，首先看到的是一块弧形淡绿色屏风，上有周恩来笔体《为中华之崛起》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百块展板美观精致，内容分六部分，包括《少年立志 追求理想》《为求解放 不懈奋斗》《开国总理 功盖千秋》《心系百姓 与民同乐》《模范夫妻 挚爱情深》《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参加开幕式并观看展览的学生、市民极为踊跃，络绎不

绝。我看到有几名八九岁的小学生，跟随爸妈参观展览后，又各自买了两本《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排队来找我签名。经询问才知，他们都还要给自己的学校送上这本书。这让我很受感动，毕竟这书要150元一本呀！

还有件我未想到的事：九十高龄的粤剧老艺术家红线女，在女儿红虹陪同下，专程从广州赶来参观这个展览。当她看到我时，高兴地对我说：“周总理的展览我当然一定要来！我今天还要赶回广州。”她对记者说：“我对周总理十分尊敬，他是领导，我是子民，他是老师，也是朋友。”

开幕式后，主办方还安排了纪东、高振普和笔者3人与百多名学生座谈，取名“周总理与我——分享会”，共同回顾周总理的伟大精神和人格魅力，谈他工作如何繁忙、如何顾全大局，谈他待人诚恳、生活俭朴等。与会人员争相提问发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可谓隆重非凡！

由此可见周恩来总理在广大香港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

(二)

这一展览还给我带来了另一个收获——认识了前国民党陆军少将蔡省三先生。蔡老先生与我讲起了封存62年的一段往事：1945年9月蒋经国先生对我伯父周恩来的一次称赞。

蔡先生是1975年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被中央人民政府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当时政府对他们的政策是：可留大陆，可

去台湾，也可另择居住地，并来去自由。蔡先生一心想去台湾，因他曾是蒋经国的部下，1941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创办《江西青年日报》时，23岁的蔡省三担任总编辑，他们之间曾共事10年。被特赦后，蔡省三等10人经停香港，等待台湾批准入境，但时任台湾最高领导人的蒋经国，却拒绝他们进入台湾。于是这10人只得各奔东西，自谋出路。蔡省三留在了香港，以写作为生。并于当年得周总理关照，特批其原配夫人到港与其团聚，使他深受感动。

尤令蔡先生感动的是，1975年9月1日至4日，新华社的《参考消息》报连续四天转载了香港杂志的一篇文章《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周总理当时虽病重在床，但他坚持看完四篇连载文章，并在最后一篇连载旁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批示：“请罗青长、家东将蔡省三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托。”

事隔32年后，在这次展览会上的一块展版上，就选用了这张有周总理生平最后一份有关两岸关系批示的《参考消息》影印件，反映出周总理对两岸和平、祖国统一大业的殷切期望与坚定信念！

时年89岁的蔡老先生，看到这块展版后，既激动又感慨，立即在《新报》上发表文章，回忆往事，怀念总理。

展览的主办人陈复生女士，看了这篇文章后，想办法找到了蔡老先生，使我得以在香港会晤了蔡省三先生夫妇。在

叙谈中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他说：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自延安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谈。我也到机场看热闹，有200多位民主人士如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到机场欢迎。9月1日晚，中苏文化协会设宴欢迎毛泽东，孙科、宋庆龄、冯玉祥将军一起迎接毛泽东一行。

我在楼下出于好奇，想上楼看个究竟。挤到楼梯口时，周恩来发现了我，他站起来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我毫无思想准备，走上前去说‘只想见见毛主席’。周恩来便让我走到毛泽东座前，我恭敬行礼，毛泽东起身，周介绍说：‘这是蔡希曾（我的原名）先生，蒋经国先生的助手，我们陪都青年界的精英。’毛泽东同我握手，用相当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说：‘好哇！好哇！全国青年大团结呀！’我有些激动，反复地说：‘是呀，大团结，大团结！’就急忙告辞下楼了。

下楼后我觉得自己有些失态，连一句礼节性的话都没说。第二天，我同蒋经国先生一起吃早餐，把昨天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情形跟蒋先生说，蒋先生哈哈大笑，问我：‘你见过周恩来多次了吧？’我说见过好几次，有一次我还对他提过不同意见。

蒋先生沉吟一会，说：‘周恩来对人那么诚恳，这不全是做作，是出于他确有素养，周恩来做人的工作是第一流的……’”

蔡先生还说：“当年，周恩来与我们这些‘蒋帮分子’可

说是政治上的‘死敌’，但我们对周恩来的风度是很佩服的。”

我想，作为政治上的另一阵营，蒋经国在评价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时，首先会以敌对视角，给以轻蔑或贬低。在他说来，对于中共人士，尽管他有所佩服，也不可能给予全面的肯定和赞扬。因此，从他口中说出的“这不全是做作”，就是很高的评价了。

听了蔡先生讲起62年前蒋经国对周恩来的这一评价，使我更加崇敬伯父周恩来，更加感到应该使青年们多了解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为中华之腾飞而忘我工作、不懈奋斗的一生，更加期盼广大青少年了解周恩来、学习周恩来，树立健康的人生目标，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使我们的民族更加兴旺、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使我们人民的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作者系周恩来长侄女，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

伯父支持我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周秉宜

1965年的夏天，我即将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

那时咱们国家正处于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一系列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活动此起彼伏，红红火火。我们附中更是从1964年秋天起便随着美院一起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作“四清”运动。据说这是全国高等院校“四清”运动的试点，以后要在全中国范围推广。中宣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联合成立了工作组进入校园，同学们停课闹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为艺术而艺术”和“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树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革命的大

时代中迎来了1965年的升学高考。

不知道是不是和党在这一时期的大政方针有关，老师告诉我们说：今年全国几所主要的美术学院都停止招生了，有招生任务的只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老师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实用美术设计人员的大学。实用美术设计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上至国家庆典，下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美术设计。作为有着8亿人口的大国，仅仅只有1所这样的大学，显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国家真的急需大批为生产、为社会、为群众生活服务的一线美术设计人员。

然而美院附中的学生过去从没有接触过工艺美院的课程，于是学校专门为我们65届的毕业生安排了图案课、设计课，还特地聘请了工艺美院的老师来给大家讲课。教室走廊上过去经常轮换着展览同学的素描、速写作业，如今却挂满了工艺美院学生设计的作品供大家观摹，有丝绸图案、化妆品包装、茶具造型、半导体收音机外型，甚至还有汽车外型的设计等。我记得看到一幅工业班学生王存德的作品，因为在上高一时，王存德曾经担任过我们班的辅导员，后来他考上了工艺美院，就不再给我们上课了。那天看到王存德的作品，心里想：他虽然改学工业美术设计了，可画得还这么好，都是因为他在附中所学的基本功扎实。

工艺美院学生的作品、王存德的作品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除了油画、国画等美术创作之外，社会上还有那么

多领域需要美术人才，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处处离不开美术设计。

多少年来，工艺美院始终未受到过附中学子的青睐，大家总有一种观念，认为搞美术设计不如美术创作。美术家、美术创作，那可是艺术啊，而一个美术设计师，设计一个茶碗、一件服装，都不能署名，谁又能知道你是谁呢。但是经过了“四清”运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大会小会，批判资产阶级的文艺观，树立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同学们都提高了觉悟，纷纷表示要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需要，报考工艺美院。我也和大家一样，决心报考工艺美院，并且努力做着各种准备。记得那时我的图案课作业是一张小花布图案设计，我上交给工艺美院的专业课作品是一个纺织女工的胸像，在她的背后还画了一排纺纱机。

报名的表格终于发下来了，这时老师告诉大家，文化部最后决定，保留一所美术学院的招生指标，即浙江美术学院，大家也可以去报考浙美。看起来宣传教育总是过犹不及，一旦具体落实，还须讲究政策，留有余地。大家的心又开始活了，毕竟绘画创作是同学们的最爱。至于我自己，既然报考工艺美院的决心已定，就不想再改变了。不过看到同学们的第一志愿都纷纷填写“浙江美术学院”，心中多少有了一丝疑惑，不知道自己的坚持究竟对不对，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否有点不合群。那一年我才20岁，考大学对于我无疑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于是我想到了伯父。我想我应该去向

他老人家请教，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一个最好的指导。

周末的中午，我来到西花厅，伯父在吃午饭，他平时总在凌晨天亮时入睡，上午10点半或11点才起床，所以这其实算是他的早饭。我知道伯父的时间很少，一旦吃过饭，他就会立刻走进办公室去办公，或者立刻出去开会了，我只能利用他刚刚吃过饭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短短的几分钟，抓紧时间见缝插针地和他谈，否则就没机会了。我把我的要求说给了值班的卫士张叔叔，他让我在值班室等一会儿，我就拿起一张报纸边看边等。一会儿，张叔叔过来说：你伯伯刚吃过饭，你赶快去，5分钟以后他就要出去了。我急忙走进客厅，一边对自己说：“时间不多，我得说得简明扼要抓住重点。”伯父刚刚离开餐桌，他两手叉着腰正慢慢地来回踱着步子，像是在活动身体。看见我，他停了下来。我说：“伯伯，我们毕业马上就要报志愿了。”他说：“噢，你要毕业了。”我说：“是，这次我们附中同学可以报考的大学有浙江美院、戏剧学院舞美系和工艺美院，我决定报考工艺美院，可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伯父就问工艺美术学院现在都有哪些专业？我说有染织、陶瓷、建筑室内装饰，还有一个工业设计，我自己想学染织。伯父没有直接表态，他没有说他同意或者不同意我的决定，他说，工艺美院学的这些专业，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都可以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我说：“是，我们老师也说过，比如为农民设计他们喜爱的大花被面。”伯父并没有看我，他的眼睛向着前方，像是在自言自

语，继续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出口商品包装设计粗糙，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的商品价格就是上不去，影响了我们国家的换汇率。我们的产品到了香港，人家换一个包装，价格就成倍地增长，我们还需要在包装设计上下很大功夫才行。伯父说的和我们老师说的完全一样，可是，话由伯父讲出来，我感觉到了它的分量，于是心里有了底，就不再多问什么，只点点头“嗯”了一声。

我知道事情谈完了就应该马上离开，不能占用伯父太多的时间。我说：“那我走了，伯伯。”正准备返身离开，伯父却又说了一句话：“告诉你们校长，附中不仅是美院的附中，也应该给工艺美院输送后备生，你们附中要加强装潢设计等有关的课程，有时间我准备找他谈谈。”

我们的校长，新中国美术界里赫赫有名的丁井文丁校长，一位延安时期的老革命，1948年在西柏坡时还担任过保卫中央首长的警卫连指导员。由于美院附中搞“四清”，他已经停职反省靠边站，接受全校师生批判快一年了。此时伯父要我转话给他，使我心中有一种隐隐的预感：莫非丁校长又能出来工作了？4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件事，伯父让我转告的那几句话，对丁校长可能有着太多的意义吧，是指导，也是关心，是爱护，也是鼓励，鼓励他放下包袱，早点出来工作。

几天以后，浙江美术学院先于工艺美院来到附中进行招生考试。全体毕业生都去参加浙美的考试，两个考场几乎座

无虚席，只有我独自一人留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埋头看书，因为在我的高考报名表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周秉宜，第一志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由此我踏上了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相伴成长的道路，也留下我和伯父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之间的一段回忆。

（作者系周恩来侄女，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会常务理事）

要做一个最普通的人

——怀念敬爱的恩来伯伯与颖超伯母

周尔均

1992年7月敬爱的七妈邓颖超同志不幸逝世，我应《人民日报》的约请，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为《看似无情实有情》。文章的中心内容，是追述颖超伯母对我们晚辈的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

当时，中央曾公开发表了她老人家的“遗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从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坚持的。”

敬爱的七伯、七妈终其一生，始终热切地期望我们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也就是做普通的人：当工人、当农民、当教师、下基层，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化，更不允许炫



196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钓鱼台

耀与国家总理的关系。为此，他们曾不得不干预对我们中间一些人的安排，明确表态，不同意任命较高的职务，当了兵的要退役，爱人从外地调北京的要返回原籍等等。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无情”，其实，在这中间正贯注他们对晚辈的爱，这是一种最深沉最富有远见的爱。他们的良

苦用心，是希望所有的革命后代自立自强，切不要成为清朝后期潦倒没落的“八旗子弟”。而他们自己则率先垂范，时时事事处处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七伯和七妈虽然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们都有一颗平常心，只愿做一个普通人。下面就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来说明这一点。

在侄儿辈中，我有幸较早见到七伯七妈并聆听他俩的教诲。抗战期间，我父亲周恩霆跟随恩来伯伯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家中生计无着，母亲带我到江苏高邮外祖父家寄居。1946年，我初中毕业，还不满14岁，没钱升学，听说七

伯、七妈因国共谈判来到上海，便千方百计找到思南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伯伯、伯母见到我很高兴，关心地问长问短，我便提出要求：跟他们去延安干革命。七伯、七妈说：“你的志向很好，这件事我们要商量一下。”其间，他俩尽管为国共谈判事宜昼夜操劳，还挤出时间专程到我寄住的亲戚家看我。过了几天，伯伯、伯母把我找去，慎重地说：“我们商量了，你还是留在上海读书，等待形势的变化。”他们给我留下钱和衣服（尽管七伯的衣服也很少）。就这样，我1949年6月高中毕业，上海解放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1955年才又同伯伯、伯母见面。一次，我同伯伯的义女、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谈起这段往事，维世大姐深有感触地说：“爸爸、妈妈对烈士子女和对自己的侄儿辈，在感情的天平上都是一样的。但他们对烈士子女的照料，却比对你们的照料更周到。在战争年代那种危险的环境中，他们把能够找到的烈士子女，大都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有的烈士子女还是他们派人从敌占区找来后送去的。抗战胜利后，你们到上海找到了伯伯、伯母，在内战即将爆发的情况下，他们却把你们留在了当地。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对革命后代的爱，实在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爱。”我体会，伯伯、伯母对亲属的严，同样贯注着爱。对侄子辈政治上的成长，他们是极其关心的。20世纪50年代初，为我入党的事，七妈曾几次给我写信，转达七伯的指示，鼓励我努力争取。她还给我组织上去信，证明我父母亲的情况。当1953年底我被批准入党、写信

向他们汇报时，七妈在病中高兴地立即给回信，称这个好消息使他俩“至为兴奋”，嘱咐我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不骄不馁，付诸实践，“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字里行间，充满了殷切的期望。七妈在信中提出共产党员的这“三个必须”，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50年代，我和后来成为我爱人的邓在军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由相识进而相爱。但我遵照七伯、七妈的教导，并没把与总理这层亲属关系告诉她，直到1955年她调到北京工作时才知道。七伯、七妈派卫士长成元功同志把她接到西花厅。刚见到总理，在军有些紧张。伯伯问她家庭成份时，她回答是“地主”（其实是煤矿工人），就更紧张了。七伯安慰她：“人是无法选择家庭出身的嘛，我也出身在封建大家庭。但每个人的道路可以选择，我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嘛！”伯伯还特地叮嘱她：“不要因为伯伯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更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们的恋爱关系中去；爱情和婚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定要注意不断地改造自己。”那天七伯、七妈留在军吃饭，平时两菜一汤，那天加一个菜，吃的是大米加小米的“二米饭”。他俩说：“现在条件好了，不要忘记‘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伯伯添饭盛汤，都是自己动手，不让别人给添。他的亲切话语和行为，永远铸进了在军的记忆里。同我一样，伯伯、伯母初次见面对她的教诲，决定和指引了在军一生所走的道路。

不久我出差到北京，同在军一道去西花厅。伯伯看到我

们特别高兴，特意送我们两张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票，反复叮咛我们：一定要到场，一定要看完。我们不理解伯伯的深意，虽然去了，由于对运动项目不是很感兴趣，又有事要办，便提前退场了。第二天又去西花厅，七伯见面就问我们：“看到毛主席了没有？”我们惊讶地说：“没有啊！”伯伯连连叹气：“你们这些孩子，就是不听话。”七妈赶快向我们说明，那天运动会毛主席要出席，因为工作，中间才能到场。伯伯遵守纪律，不能提前告诉你们，又想让你们有一个难得的见毛主席的机会，所以嘱咐你们要看到底。我们当然懊悔不迭。七伯还细心地问我们退场后票怎么处理的，我们说门口等票的人很多，送给他们了。伯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从这件事，我们深深体会到伯伯对毛主席的尊敬，他从切身体验以及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从来都是突出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从来不提自己。我们也深深体会到伯伯、伯母对后辈的关怀爱护，深深体会到他俩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警惕性。

恩来伯伯一方面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用不必要的清规戒律束缚自己，脱离群众。他总是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触人民群众。我们在西花厅陪他散步，他有时不带警卫，从后门走到大街上、人群中。听说他还搭乘过公共汽车，同群众交谈，了解情况。

1956年，七伯出访亚洲8国回来，住在重庆部队招待所，我去看他。伯伯还没顾上说话，嘱咐我先去看陪他出访的贺

龙副总理。他说：“贺老总就在隔壁，他是你们的老司令，快去问声好！”我看望贺总时，注意到他住的是套间，而伯伯住的是很小的单间。卫士长成元功告诉我，招待所只有一个套间，原来安排给伯伯住，伯伯让给贺老总了。我还注意到，吃饭时伯伯一个个检查过问，等所有随行人员都到齐了，才动筷子。由于这次访问非常成功，伯伯很高兴，同每个人碰了杯。

1959年我调到北京，到西花厅见七伯、七妈。伯伯问我，听说你调动工作了，具体的部门在哪儿？我说在总后卫生部。伯伯就问我，部长是谁？我说是饶正锡同志（注：当时是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后曾担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伯伯说：“噢，他是从新疆调来的，我很熟悉。”正好我调来后熟悉了饶正锡同志的履历表，我说是这样，他担任过新疆迪化市的市委书记。伯伯说：“哎！你怎么说是迪化？”我知道伯伯的意思，因为迪化市已经改称乌鲁木齐了，我说我知道迪化现在已经改名，我是看到他的任职表是迪化市委书记。然后伯伯就问我知不知道“迪化”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说实在的，当时我只回答了一半。我说，迪化的“化”是同化的意思。因为我联想到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但对这个“迪”字，并没有深想，七伯还是很高兴，鼓励我：哎，你回答得不错。伯伯主动地讲，“迪化”，“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不尊重，对新疆要“启迪”、“同化”。然后又问我，能举出多少这样对少数民族有侮辱性

的地名。我就边想边说，伯伯也帮我一旁提醒，帮助凑。比方说“绥远”，以前有个绥远省。比如说“镇南关”，当时已改称睦南关。比如说“安东”，改成了丹东。还有“抚顺”“靖边”“安塞”等等。类似的地名，一起凑了不少。伯伯就讲，我们过去实行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各个民族之间都是一律平等，各个国家之间也都是一律平等。跟七伯在一起交谈，他都持这种平等的态度，从不让人感到高不可攀，我们晚辈在他面前没有一点拘束。

七伯、七妈总是教育我们，“好事要先尽着群众”。他们首先是身为表率，最严格地要求自己。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为秘书在他外出期间简单地修缮了一下西花厅，少等地发了火。为这件事，他住在钓鱼台临时住所坚决不回去，连陈老总去劝也不行。一次，我去钓鱼台见伯伯时，为了缓解他气愤的心情，劝他说：伯伯，您平时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这个房子已经相当破旧，这是历史文物，简单地维护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没什么大错。七伯说：你讲的也有一定道理，但你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头修房子，下面就会跟着干，还有副总理，有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地下去，不知道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也就很好了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他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看过，背诵了最后那几

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伯伯说，你再重温一下这首诗，这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气愤。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伯伯让秘书把新换的床还回去，吊灯拿下，窗帘摘掉，这才搬回西花厅。他在国务院会议上两次做检查，都是检讨自己，一字未提经办的秘书。

恩来伯伯有高度的原则性，处理问题，旗帜极其鲜明。他有时问我们单位的一些情况，做一些调查研究，但从不表示他的意见。我们也从不传他的话，从不替人转信，这是个原则。但也有一次例外。当时我还在重庆工作，到北京来汇报肃清反革命运动的情况。开展这个运动有当时的历史需要，但也带来了打击面宽的局限性。我到西花厅看伯伯，他问我来做什么，当我说明后，又问我所在单位查出一些什么问题。我一一列举数字，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伯伯听得很仔细。他深思后说：这里面有问题。他说，你们一个军级单位，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反革命，不可能有这样多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接着他说，你把我这个话捎回你们单位领导，就说是我的意见。我回去后向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汇报了，这位同志后来担任过总后副政治委员。他当即主持召开党委会，传达总理的指示，立即贯彻和纠正偏差。在这个问题上，伯伯是用大原则管小原则。这也是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群众的又一生动例证。

我和在军常说，拍完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后，

感到我们过去对伯伯的伟大人格了解得太少、太肤浅了。尽管如此，回忆往事，仍然使我们激动不已。这些小小的事例从一个侧面说明，恩来伯伯和颖超伯母从来只愿做一个普通人，决不把自己当大人物，也从不愿被载入史册。可以说，周恩来是一位不愿成为伟人的伟人，也是有别于其他伟人的伟人。正因为他不愿成为伟人，却因此成为伟人中的伟人。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力量，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尽管时间可以流逝，大地可以荒老，只要人类在生生不息的延续，我们将永远记取这笔无价的财富！

（作者系周恩来侄儿，曾任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

怀念我们的七叔

周华绂

我叫周华绂，是周恩夔、陆淑珍的女儿，父亲在周家大排行老四。祖父周嵩尧，字岫芝，排行老六，周总理喊他六伯父。他是清代举人，曾任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解放后移居北京。

周恩来是我的七叔，他多次和我祖父周嵩尧见面谈及有关历史问题。由于七叔的影响，周嵩尧进京不久就将大批文物捐献给国家。祖父在任江苏督军秘书长时，曾劝导李纯，从而阻止了江、浙两省军阀的一场内战。七叔对此评价很高，后来周嵩尧被七叔特聘为文史馆的馆员，这在我们周家亲属中是唯一的。

除了祖父外，父亲、母亲受七叔的影响也是很大的。1946年，父母对国民党绝望，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前往南京梅园新村，见到了七叔，他们在一起吃了饭。返回扬州时，七叔写了一封信，内容主要是“人生赖奋斗而存”，劝导我父母走生产之途。这信当时是由秘书送到父母住处的。母亲

说，这信由她负责保管，不许我们公开关系。保管了近40年啊！七叔逝世后不久，我们把它捐赠给了国家档案馆。

七叔、七婶对我们晚辈的要求更是非常严格了。

1960年7月，我和我的七嫂刘宝兰一起到了北京，8月，七叔、七婶会见了我母亲、五哥华璋一家、七嫂和我。七叔问我：“你是不是六伯父经常提到的那个孙女啊？”我答：“对，对！”接着七叔说：“每个亲属来，我都要给他上一堂政治课，首先问一下，你家庭出身是什么？”我答：“破落地主。”七叔又问：“为什么要加‘破落’两个字？地主就是地主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接着又关心我上学的情况，问道：“你们在学校劳动课干些什么事啊？”我说：“种菜、种茨菇、干农活。”七叔问：“茨菇怎么种啊？”我告诉他：“将苗子摘下来，插到土里。”七叔说：“噢！原来茨菇是这样种的。”后来又谈到我未来工作志愿，我说：“打算做个教师。”七婶当时举起双手说：“我双手赞成，做老师好！”七叔、七婶对我的关心和教育，我牢牢记在心中，并成为我奋斗一生的动力源泉。

（作者系周恩来侄女，本文为1997年3月5日在周恩来纪念馆纪念周恩来99岁诞辰会议上的讲话，部分文字稍作改动。）

老红军杨志宏眼中的周恩来

杨志宏 口述 曹春荣 整理

老红军杨志宏，1932年从瑞金沙洲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随部队离别瑞金踏上长征路，从此，南征北战，最后到了北京，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在戎马生涯中，他曾几度在中革军委工作，近距离地接触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身体会到周恩来巨大的人格魅力与风范。

可亲的自家人

1932年春末，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中央直属县的瑞金，召开了一次党、团活动分子会，会场设在县城边的上杨村杨氏宗祠里，上首放着一张八仙桌，算是主席台。桌子后面，摆了许多杂七杂八长长短短的板凳。桌子一侧放了个木桶，桶里的开水已经没了热气，木桶旁边，有些供喝水用的粗瓷碗。看得出，这些家什都是临时从附近老表家里借

来的。

参加会议的全是瑞金各地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支部书记。杨志宏时年16岁，以下肖区官山乡共青团支书身份与会。他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后，抬眼就见八仙桌旁坐着一位短发长须的长辈，浓浓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特别有神。这使他虽然身着普通的灰布衣服，脚穿普通的圆口布鞋，却依然引人注目。杨志宏正待猜想此人是谁时，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开会，接着对大家介绍八仙桌旁的人说，这位就是中央来的周恩来同志，他今天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听说是中央来的领导，可了不得呀，大家赶紧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周恩来微笑着向大家点了点头，算是回礼。杨志宏特别高兴，想想自己乡巴佬一个，过去连县官也没见过，现在却能和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坐在一起开会，真是三生有幸啊。

这次会议开了两天，先由各地汇报前一段的工作情况，讨论今后怎样进一步开展农业生产竞赛、扩大红军、帮助红军家属耕田，以及党团员如何带头做好各项工作，积极参军参战等。周恩来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不时在小本子上记一下，遇上听不懂的瑞金方言时，就打手势，说声“对不起”，然后才要求发言者解释。因而虽然大家面对中央来的大领导说话，倒也不紧张，就像和自家人在一起聊天一样。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应会议主持人要求讲了话。他怕大家听不懂北方官话，便尽量讲得慢些、好听些。有时口渴，就拿起粗瓷碗，从木桶里舀上半碗水喝。杨志宏本来想把周恩来讲的内

容都记下来，可惜他的文化水平实在够不着，结果连听也听不全。不过，他在会后问过几个熟人，连猜带体会，也把周恩来讲的大意弄清楚了。官山乡迅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一次就动员了十多个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工作也做得不错，全乡红军家属后来写给红军的慰问信，还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

可敬的领导人

1933年夏，杨志宏进了设在瑞金城里的红军学校。因为个子小，不够当学员的要求，就先给学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黄火青做了几个月的勤务员。次年春，他才进了从红校分设在九堡的彭杨步兵学校，在青年队当学员。这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杨志宏刚听完教官的课，就听说陈赓校长叫他马上去谈话。他怀着紧张的心情，快步来到校长室。陈赓招呼他坐下后，问了他许多话，最后对他说，现在要调他去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工作，明天就去报到。并交待他要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努力工作。

中革军委机关驻在瑞金城西南3公里的乌石垅村，一幢土木结构、二进三间的两层楼房，加上临时搭建的稻草盖顶的木板房，住了几十号人。其中有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等。杨志宏和他的两个红校同学一起，住在周恩来住处西边楼上。楼层又低又暗，像小

船舱。

军委机关的生活比红校的生活更艰苦。红校学员吃饭不定量，管饱，每人每月还有五角钱津贴费。军委机关干部一天只有一斤米，分两餐吃；下饭菜大多是南瓜、青菜，不仅没什么油水，有时甚至连盐都没得放。此时由周恩来主持中革军委日常工作，他常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往往还饿着肚子。其他人值班是轮流，但没人能替他值班。当时值夜班也没有夜餐费，只是由当班通信员做点白天那样的饭菜填肚子；碰上伙房有剩余饭菜，就更简单了，将就着对付。周恩来有时看见饭菜不够，或者正忙于工作，就对别人说他不饿，让给别人吃。偶尔前方下来的同志带点好吃的东西送他，或是住地附近相熟的群众送几个鸡蛋给他（他会变着法子给老表钱），他也总不忘分给大家吃，要不就给伙房处理。杨志宏看到这些情形，对周恩来充满崇敬之情。

1934年7月中旬以后，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颓势日显，蒋介石的飞机对瑞金、特别是沙洲坝地区的袭扰也日益频繁。距离沙洲坝只有一两里地的乌石垅，自然不得安宁。军委机关无法照常工作，每天一早就跑到乌石垅南面十几里地人烟稀少的山沟沟，找个树荫下或岩洞办公，傍晚再回乌石垅。这样一来，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就更辛苦了。有一次，杨志宏他们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一间废弃了的土屋子，在屋里安装了临时电话。周恩来每天都要费去好多时间和精力，接听或者拨打电话。此外，不是批阅公文，就是撰写文

字材料，或是找人谈话。一天黄昏，大家正准备下山回乌石垅，眼看周恩来放下了电话机，他却又叫人找钱壮飞（国家政治保卫局中革军委分局局长）过来谈话。大家只好等他谈完了再走。

7月下旬、8月初，中革军委从乌石垅搬到瑞金城西15公里的梅坑，在这里的岩背学堂及附近民房办公。这时，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各项准备正加紧进行，军委机关异常繁忙与紧张，加上生活艰苦，周恩来终于病倒了，好些日子起不了床。他亲笔写了“谢绝来宾，禁止喧哗”的纸条，贴在房门上。杨志宏和战友们看了纸条，经过周恩来的房门口都蹑手蹑脚、大气不出，希望周副主席能通过静养而早日康复。然而，让大家大惑不解的是，周副主席房门口安装了一部电话机，一天到晚铃声不断，这哪里能让他得到片刻安宁呢？很快，杨志宏就想明白了，原来周副主席写那字条的用意，是怕自己的病有传染性，为了照顾别的同志的健康，而又不予明言，以免增加别人的思想负担。周副主席真是用心良苦啊！

可畏的铁面人

周恩来的面容总给人以和蔼友善的感觉。他对同志对群众的关心体贴，更是有口皆碑。不过，在原则问题上，他却毫不含糊，对违反原则的人和事，绝不姑息迁就，给人以铁

面无私的印象。杨志宏就亲历过这么两件事，见证了周恩来令人畏惧的一面。

1934年7月的一天，杨志宏正在村外水沟洗衣服。忽然，天空中一阵轰鸣，原来是蒋介石的飞机又来捣蛋。飞机盘旋几圈，扔下3颗炸弹在篮球场北边后，就掉头飞走了。3颗炸弹中有1颗没有爆炸，一半栽在泥土中，一半露在岗脚边。为了安全起见，有关方面通知大家不要接近落弹处。可是，有人好奇，总想近距离看看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一天晚饭后，在中央局工作的一位女同志，不听哨兵招呼，硬要上前去看那个炸弹，还奚落哨兵说，如果现在怕这颗炸弹有什么危险，他就是土包子。这时，恰好周恩来路过这里，见到刚才一幕，他很不客气地批评了那位女同志一顿。那位女同志从来没看过周恩来声色俱厉的样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认了错。

1935年春，中央红军长征到了贵州。一天下午，部队在路上原地休息时，杨志宏看见路旁一个村子的外边有好多马，不少老百姓在试骑，看看谁家的马好。不料，中央队的李德（共产国际派给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看中了一匹马，就叫人把马牵来。老百姓发现后追了一阵，不敢追了，只得无可奈何地看着马被牵走。部队继续行军后不久，周恩来就知道了老百姓失马的事。他让大伙往后面一路传话过去（传话是红军在长征路上经常采用的一种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既简便又迅速的方式）问问谁牵走了老百姓的马。后面传来

回话，说是李德。周恩来听了，立即又高声命令传话：“往后传，叫李德把马放掉，还给老百姓。我说的！”从话音和语气里，可见周恩来此时的心情是极其激动的。末尾特别加上一句“我说的！”则是此前传达口头命令时从未有过的。这个凝聚着对违犯军纪的义愤和维护军纪的威严的口头命令，很快就发生了效力。没过多久，杨志宏就远远看到那匹马自动跑回村子里去了。这件事，使杨志宏领略到周恩来为了维护革命纪律和群众利益，不顾任何情面，斩钉截铁般迅速果断处理问题的行事作风。

（本文系老红军杨志宏2010年口述，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曹春荣整理）

难忘的一次握手

周研森

我是1950年初，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奉调到政务院秘书厅总务处招待科做接待工作的。当时，招待科除科长年龄较大些外，其余的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小的只有十几岁，干起工作来朝气蓬勃、虎虎生气。由于周总理的严格要求，我们都知道招待工作的重要性。周总理经常在开会之前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看看会场布置的如何、场地卫生好不好、招待用具干净不干净……对会前一切检查的都非常认真仔细。如果我们的工作经过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说明经得起周总理的检验，全科上下每个同志都非常高兴。周总理不单严格要求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每一位招待员也都是非常关怀的。只要他的时间允许，就会和招待员聊起家常。时间不长，他对我们科里几十名招待员就比较熟悉了。我在招待科工作了1年，于1951年底调到政务院秘书厅交际处联络科工作。从此以后，我接触周总理的机会就很少了。

1955年初，我由国务院秘书厅总务处管理科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行政组工作，行政组下设一个招待组，负责国务会议厅和周总理西花厅院内的前客厅的招待工作。这两处都是周总理召开会议和接待外宾的专用场所。有一天周总理要在前客厅接待外宾，我们组里的同志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我也去前客厅帮忙，以防有什么不周之处。这时，周总理也由他的办公室来到前客厅。我和他相遇，他一眼就认出我来了，同我热情地握手说：“周研森同志，你来这里工作了，好啊！欢迎你。”周总理的招呼与握手，是在我们相隔几年后发生的，他还是那样平易近人、关心下级，使我深受感动，难以忘怀。

其实，我先前在招待科时，也同周总理握过手。因为在那时我们与周总理见面的次数较多，握手的事就少了。可这次大不相同，是在几年之后，周总理工作繁忙，日理万机，办不完的国家大事。他还能认出我这个几年前曾经做过招待员的人呢！使我更为惊讶的是：事隔几年之后他能即刻呼出我的名字！我原以为周总理对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层比较熟悉，不曾想到对接触过一名普遍招待员也多年不忘。周总理的记忆力强，这事是人人皆知的，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记忆力的问题，而是周总理伟大人格的体现。

（作者系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行政干事）

伟大的声音

李连庆

1968年8月23日，在苏联公然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3天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奥雷尔·杜马紧急求见周恩来总理。下午4点，周总理迈着稳重的步伐，右手平端胸前，矫健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北门，来到宽敞、雅观、大方的福建厅，这是他平时最喜欢用的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早已到来的陈毅、李先念副总理以及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听说总理来了，都站起来，走至门口迎候。总理满面春风地走进来，同大家一一握手，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热情的态度，温暖的巨手，给每一个人以亲切的感受。总理坐下来以后，外交部工作人员报告说，“参加接见的人都已准时到了”，总理听后满意地点头说，“现在就通知杜马大使，请他按约定的时间到来！”

总理有一个习惯，每次接见外宾前后，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同参加接见的同志交谈，或听取汇报，或探讨问题，有时谈会见外宾有关的问题，有时是最近发生的重大国际国内

问题，有时也涉及历史、文学诸类问题，总理总是耐心地听取、平等地讨论，平易近人，无拘无束，在他面前能够畅所欲言，什么话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即使是不对的、错的也没有关系，每次谈话、讨论都使得参加者得到莫大的启发和教益。今天更不比往常，总理入座后，就和他对面坐着的陈毅、李先念副总理等讨论起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威胁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安全的事来。总理微皱着眉头，略显愠怒地说：“苏联公然用武力侵略别国，简直把马克思主义糟踏完了，把列宁斯大林糟踏完了，把社会主义糟踏完了！”

陈毅副总理紧接着忿忿地说：“真是今古奇观啊！此种恶例一开，后患无穷！”

总理端起茶缸，喝了一口茶，用敏捷而锐利明慧的目光扫视了在场的每一个同志，加重了语气说道：“苏联同美国的激烈争夺，必将导致全世界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这次又出兵侵占捷克，连东欧国家都不得安宁……”总理一回头，又提高了声音，脸上显现着一种刚毅的神态，他坚定地说：“我们要揭露它，让全世界人民看穿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要主持正义，要尽国际主义义务，即使是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也要勇敢地站出来说话，支持、声援那些被侵略、被威胁国家人民的斗争！”总理用手势加强着他的话的语气，浓眉下的眼光闪烁着，坚定有力的声音感染了每一个在座的人。

陈毅副总理豪爽坦诚地颌首说道：“不仅是我们这一代，还要教育我们的子孙，不管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只要他侵略，欺侮别人，我们都要主持正义，主持公道，帮助弱小，同霸权主义斗争到底！”

“杜马大使到了！”礼宾官报告，打断了热烈的讨论。

总理、陈毅、李先念副总理等从沙发上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一位个子不高，头发稀疏、高鼻梁、身着西服，白色的衬衣领上结着红色印花领带的人，匆匆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北门，他就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奥雷尔·杜马。他在中国已经任职好几年了，为发展罗中两国友好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在人民群众中都知道他的名字。在外交使团中，由于他的活跃，常见到中国领导人，成为新闻人物，不少使节时常向他打探消息。还由于他的名字同《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中提到的沙皇议会“杜马”是一个音，所以使人特别容易记。今天他带着一个瘦高个子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的翻译，奉罗马尼亚政府之命前来求见周恩来总理。

外交部礼宾官引导杜马大使走进福建厅。

周总理、陈毅、李先念副总理等站在福建厅的门口迎接杜马大使。杜马大使一见，赶忙紧走几步，总理也向前挪了几步，两人亲切而有力地握手。

总理说：“欢迎、欢迎！”

杜马说：“谢谢总理在百忙中接见我！”

总理说：“我们是同志，是战友嘛，既然有事找我，那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乐意见你！”总理边说边让大使同陈毅、李先念副总理等握手，然后一同步入福建厅里。

在客人坐下来以后，总理随手从座位旁边的茶几上拿起一包熊猫牌香烟，递过去，请坐在他的右边的杜马大使和翻译同志抽烟。大使谦恭地接过一支烟，划了根火柴把烟点着，顿时一缕青烟缭绕，馨香扑鼻。

大使首先开口说：“周恩来同志，我奉我们党中央和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指示，向您通报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谢谢！”总理说：“你是讲的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吗？”

“是的！尊敬的总理同志！”接着，杜马大使继续通报情况。

杜马大使讲完之后，总理端起白色的瓷茶杯，抿了一口龙井绿茶，脸带怒色地说：“苏联出兵侵略自己的‘盟国’是它的霸权主义又一次大暴露。”

大使放下烟，喝了一口茶，说道：“现在我们这位北方朋友不仅是重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还调集了大批军队集结到我们罗马尼亚边境，妄想进犯我国！”

“胃口不小啊！”李先念副总理说。

“我们国家已是全民动员起来，誓死保卫我们的神圣的祖

国。我们也急切希望得到国际上、特别是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

“那是义不容辞的事!”总理郑重地说。

杜马大使说:“今天是我们罗马尼亚解放24周年国庆,我奉我国政府之命邀请总理出席我们招待会,并发表讲话,支持我们的斗争!”

“那我要放炮的!”总理爽朗的笑了起来,锐利的目光看看杜马大使。是的,在一切危害人民利益,侵略他国人民生存权利、威胁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势力、集团面前,我们的总理从来是要放炮的,这正是总理的风格、总理的精神,也正是中国人民的情操,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风波征途熔铸的革命精髓。

杜马大使对于总理坚定而又风趣的答对,非常高兴,连声说:“欢迎!欢迎!”

“那好,那好,我一定去!”总理边说边指着陈毅、李先念副总理等说:“他们也一道参加。”

杜马大使轻快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满脸笑容而又亲切地说:“亲爱的周恩来同志,我难以用确当的语言感谢您,没想到您如此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当天下午5点多钟,各式各样牌号的轿车,车前雪亮的镀电杆上张扬着各国的国旗。一辆接着一辆,鱼贯地开进幽静的东交民巷北侧、台基厂东侧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大使馆是一幢不大的红色楼房,楼房的四周是个红色围墙。楼房

前面古树森掩，绿茵如毯，窄窄的水泥弯径，盘旋在楼前林荫之中。在楼房的东边院内，有片长得绿油油的草坪。

草坪上整齐有序地摆有几十张铺着白色台布的小圆桌，桌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酒、汽水、矿泉水、啤酒等饮料。放着花生米、核桃仁、三明治、面包片、春卷、巧克力糖等零食。

出席今天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的人比往年出席招待会人要多得多。草坪上早已挤满了各国来宾。

8月的北京正是盛夏，天气异常炎热，但因为是罗马尼亚国庆节，人们出于礼貌，都身着漂亮而又整齐的西装或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夫人们也都穿着红红绿绿的裙子以及各种时髦的服装。有的人手拿汽水、啤酒，有的人拿着威士忌、白兰地、罗马尼亚葡萄酒，有的人吃着零点在草坪上来回走动，相互碰杯、交谈、聊天。穿着白色上装、蓝色裤子的中国男女服务员们捧着饮料、零食，轻快而有礼貌地在会场上走动，彬彬有礼地招待客人。但是气氛总是不如往常那样活跃，因为在人们心头上仿佛压着一块石头，担心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不知会如何发展，对今后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多大的影响？忧虑和不安的气氛笼罩着会场。

然而人们也都有另一种希望：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站出来说话，主持正义，主持公道。使节们三五人一群围着出席招待会的中国官员，探听中国的态度，询问中国哪位领导

人出席今天的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来不来？

在北京的外交界中，不管是大使还是一般的外交官，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也不管是持何立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能够经常见到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周总理的卓越的政治远见、深刻的洞察力、高尚的品质、文雅的风度非常钦佩，仿佛在周总理的身上，有一种巨大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外国使节们把有机会得到周总理的接见、作一次交谈，视作无上的光荣。即便同周总理照个相、握个手、碰个杯，寒暄几句也觉得十分荣幸。在北京的外交活动中，若是有周总理参加，人们便会感到一种欣慰、满足。若没有周总理参加，总觉得有所不足。特别是在国际风云变幻之际，如果周总理出来讲几句话，人们便会得到一种安慰和鼓舞。因此，周总理是否出席今天的罗马尼亚的国庆招待会，成为人们特别关心的事情。

下午5时半，一辆吉斯车，后面紧跟着两辆红旗车，开进了罗马尼亚使馆。周总理、陈毅、李先念副总理相继从车上走下来，杜马大使和使馆官员亲自迎上前去。

不知是谁叫了声“周恩来来了！”会场上顿时不断地呼唤着：“周恩来！周恩来！”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同时发出了一个声音。周总理等在杜马大使的引导下，从容不迫地走上面对大家的主席台，人们热烈鼓掌。几百人的目光同时射向主席台，注视着周总理的仪态和表情。周总理端坐在主席台中间，目光炯炯，神采奕奕。这时，所有的外国使

节、官员和记者们的思绪都集中在周总理会不会发表讲话、讲些什么，对这次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是何态度上。

也在现场的苏联大使馆代办，是个又胖又壮的高个子，人们给这位代办起了个绰号叫“苏联熊”。今天，“苏联熊”不同往常，他预感到事情不妙，坐立不安，拿着一杯威士忌，东跑西窜，一会儿同这个使节讲几句，一会儿又找另外一个使节攀谈，还有意凑到中国外交人员面前，假献殷勤。

招待会进行到1个小时以后，主人、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首先从主席台上站起来致词。他衷心感谢周总理出席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特别是在苏联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表达了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的巨大支持。他热情称颂罗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人民在关键的时刻，总是站在罗马尼亚人民一边。他极力赞扬罗马尼亚政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政策。他愤怒谴责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威胁罗马尼亚的安全。他说“苏联的行动，是违背联合国宪章，背叛社会主义，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强烈希望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制止苏联的非法行为。杜马大使的讲话，受到人们的欢迎、同情和支持。只有苏联代办低着头，神情沮丧地呆站在那儿。

过了一会，总理应邀讲话。他站起来，在一片寂静中，缓缓走向话筒。他以亲切、坚毅、深沉、明亮的眼光扫视一下各位大使们和来宾，会场上马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周总理

在对罗马尼亚国庆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后坚定地宣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占领的英勇斗争，苏联领导集团抛弃了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国际主义的一切遮羞布，公然诉诸于直接的武装侵略和干涉”。

周总理一针见血的抨击和击中要害的分析，又一次使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北极熊”侵略行径面前的大义凛然，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周总理最后又重申了对罗马尼亚人民的支持。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相信，只要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斗争，任何外来的干涉和侵略是可以被击败的，也是一定能够被击败的！”

周总理的话音一落，全场又响起热烈的掌声。

周总理一边向大家招手致意，一边稳健地走向自己的座位。杜马大使连忙站起来，热烈地拥抱着周总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衷心感谢您对我们罗马尼亚人民、东欧各国人民的巨大支持和声援。您的伟大声音将响彻欧洲，响彻全世界，也对朋友是个巨大的鼓舞，对敌人是沉重的打击！”

历史的进程是总理伟大声音的注释。

我们怀念斗争的8月，怀念8月里总理的声音，这伟大的声音……

世界前进的方向是任何霸权主义者扭转不了的，无论是

大霸还是小霸。伟大的声音将永远鼓舞人们去同霸权主义斗争。因为这个声音不仅发自一个伟人的心腑，而是汇集了几十亿人民的心愿。人民是不可欺侮的。

8月，我们怀念那伟大的声音……

（作者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中央电视台台长等职，江苏涟水人）

见微而知著

——周总理是铭刻我心中的丰碑

侯云珍

我是从15岁开始就在宾馆饭店做服务员工作的，一直干到退休，其中1954年至1984年在和平宾馆工作，所以接待周总理等领导人的机会比较多，虽然都是一些生活琐事，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下面我就讲讲周总理的几件“小”事。

一杯冰激凌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周总理陪一位从天津专程来京为邓大姐复查子宫瘤手术的余大夫吃冰激凌。由于他的时间很宝贵，事先由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用电话预订好，以便他和客人一到就能吃上。当时我是和平宾馆西餐厅的服务员。当我们宾馆接到电话后，孙仲南书记、董峰经理都十分重视，亲自下厨房做准备，但是，餐厅经营的冰激凌有七八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种，电话里又未问清总理要吃哪一种，怎么办呢？孙书记说：“总理特别忙，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赶紧布置工作人员把各种冰激凌都做出几份备用。晚上11时许，总理陪着余大夫一行来到了我们餐厅。我们立即拿出菜单请总理点用，他很快就点了。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总理只给每人点了一杯冰激凌，而他点的那一种更普通的我们却没有准备。当时，我们又着急，又感动，着急的是厨房专门为总理准备的冰激凌三德、冰激凌苏打、冰激水果等七八种档次稍高一点的全没用上，可唯独没有准备那种一挖就一个球的最普通的冰激凌；谁能想到一位堂堂的大国总理请客只用一杯极为普通的冰激凌呢？

为中法友谊吃羊肉

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曾在法国驻华使馆举行答谢宴会，周总理当时是紧靠蓬皮杜坐在主宾席位上的。宴会菜单中有一道烤羊腿，我们服务员都知道总理不吃羊肉，上菜时就只象征性地放了一些配菜。总理发现后当即用目光示意我们给他放上点羊肉，而且他欣然吃了下去，后来我们才意识到总理是在为中法友谊作真诚表示。因为蓬皮杜总统为了体现中法友好精心安排了这次宴会食谱，全部食品都是从法国巴黎用专机运到北京的，而他答谢的主宾又是中国的总理。这道菜吃不吃，是事关主客之间友好关系、中法两国之间友谊的大事。所以，周总理还是泰然自若地在客人面前吃下羊肉，可见他老人家为中法关系考虑得多么周全周到啊！

按新价收费才喝酒

一次，周总理在四川饭店请客，服务员都知道总理爱喝茅台酒就向他推荐。但总理知道，当时高档酒正准备调价，各销售单位已经封存起来了，新价又没有出台，用了怎样付费呢？最后总理示意还是不用了吧。正在为难之际，服务员灵机一动说，总理可以先用，等新价出来以后再付钱，总理一听非常高兴地说：“你这个主意好，我照你的意见办。”结

果，总理和客人高兴地喝起了茅台酒。后来宾馆领导还把这件事当作典型向我们作了传达：一是作为服务员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要学会灵活服务，二是总理对自己一向要求极其严格，虽然当时新价还未出台，也要等新价出台后，按新价付费他才肯喝茅台酒。

吃剩菜剩饭

1961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一天中午刚开完午饭，服务员正在撤台收拾餐具，总理突然来了要用餐，服务员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跑到厨房给总理准备饭菜。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总理径自走到尚未撤台的一桌前坐下来，就拿起馒头吃起来，服务员赶紧递上一双干净筷子，没等热菜热饭端上来，总理已经吃完饭了。他还放下一张餐券，向在场的服务员摆摆手就匆匆忙忙地走出了餐厅。

“文革”初期，水利部在和平宾馆召开一次水利工作会议，主办会议领导特意向服务员交待：会议只供应白开水，不要供应茶水。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周总理亲自规定的。这次会议总理亲自出席与代表共商治水大计，会议一开几个小时，可他连一口茶水都不喝，真叫人心疼啊！多好的总理啊！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老人家！

（作者系曾在北京和平宾馆工作过的服务员）